



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

晚清外交七十年

第二部

李书纬◎著

海外借

- ★ 从慈禧垂帘听政到中法海战爆发是王朝繁荣还是危如累卵？
- ★ 透过外交看晚清，还原李鸿章等权力大佬们荒诞的政治更张
- ★ 史料翔实，捅破“炮舰与合作”下的同光时代竟是蛋壳里的中兴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纲要》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纲要》的出台，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纲要》的出台，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纲要》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晚清外交七十年

第一部

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

李书纬◎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外交七十年：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 / 李书纬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060-9878-6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外交史—中国—清后期 IV. ①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1052 号

晚清外交七十年：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

(WANQING WAIJIAO QISHINIAN TONGGUANGZHONGXING ZHI YULANGGONGWU)

作 者：李书纬

策划编辑：鲁艳芳

责任编辑：辛岐波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

字 数：36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878-6

定 价：48.0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4086980-823

Content 目 录

第一章 “合作政策”下的“接轨”与奇景

- 一、恭亲王奕訢为什么要设立总理衙门 // 002
- 二、西华德“合作政策”“拥抱”大清 // 013
- 三、慈禧太后“借师助剿” // 018
- 四、阿思本闹剧 // 030
- 五、洋特使成了御用打工仔 // 040
- 六、海关总税务司的如是“仆人” // 051

第二章 “天津教案”与曾国藩的“诚信外交”

- 一、中国多地惊现排外事件 // 062
- 二、崇厚的应急措施 // 073
- 三、曾国藩临危受命 // 079
- 四、究竟应该抓捕多少反洋教的官民 // 086



五、曾国藩背上了外交黑锅 // 097

第三章 “马嘉理事件”的交涉与郭嵩焘出使

- 一、为什么会发生“马嘉理事件” // 108
- 二、李鸿章“失策”威妥玛七点要求 // 120
- 三、“滇案”会审局中局 // 134
- 四、赫德成了“滇案”顾问 // 141
- 五、李鸿章要“和平”压倒一切 // 148
- 六、慈禧太后派出了“道歉专使” // 156

第四章 伊犁梦魇与虎口索食的左宗棠和曾纪泽

- 一、俄国在大西北播下侵华的阴霾 // 166
- 二、左宗棠西征中的新疆谋略 // 173
- 三、崇厚使俄“优礼有加” // 191
- 四、左宗棠“补偏救弊”批驳“三大端” // 197
- 五、该不该惩办崇厚以及“废约”之争 // 204
- 六、曾纪泽用“洪荒之力”虎口索食 // 213

第五章 “联日”幻想带来了大麻烦

- 一、天皇“维新”与李鸿章的“联日”幻想 // 224
- 二、摆正了扩展位置的“友好条规” // 234
- 三、李鸿章梦碎“北京专条” // 245
- 四、在琉球问题上日清叫板 // 255
- 五、清朝抛给琉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 263

第六章 纠结的中法海战交涉

- 一、法兰西要当越南的“保护者” // 278
- 二、法越间的条约点燃“甲申易枢”的火信 // 283

三、李鸿章排除了曾纪泽这个“异己” // 296

四、李鸿章与福禄诺的“面子”和谈 // 306

五、慈禧太后反赔偿“设法回天” // 315

六、金登干“枪手外交”让清政府很受伤 // 325

参考文献 // 337



Chapter

第一章『合作政策』下的『接轨』与奇景



一、恭亲王奕訢为什么要设立总理衙门

1860年九十月间，奉命留守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的恭亲王奕訢在接受这个任命之时，心里很有些不情不愿。外国人从天津北塘登陆到进师北京，只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便伤亡惨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些情况恭亲王都是知道的，因而当咸丰帝让他主持议和时，他虽然接受了任命，但内心的畏惧感使他并不太乐意。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他便跑到长辛店躲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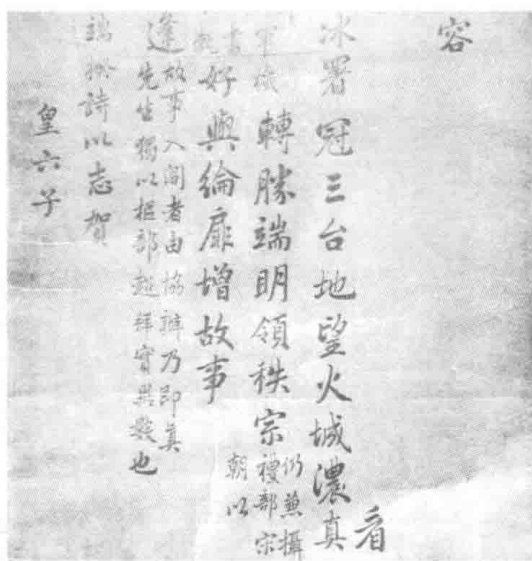


领衔总理衙门时的恭亲王奕訢



奕訢虽然对洋人抵触反感，甚至有些畏惧，但是君命如山，他得办好“抚局”，因此他在北京设立了有办公处所的临时机构，地点在海淀的善缘庵。这个临时机构设立之时，奕訢向咸丰帝奏报：臣奉命办理抚局，于圆明园如意门外善缘庵内设立公所，两旬以来并未挪动。

但是，这个临时机构设立后，由于清政府没有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闯进圆明园，一番抢掠之后，又一把火烧毁了这座名冠中西的“万园之园”。恭亲王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与列强交涉。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英、法、俄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经此大劫，奕訢率办事人员仓皇躲避，办理“抚局”的临时机构也几度搬迁。从圆明园被烧到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根据当时的记载，奕訢先后迁到法源寺、地安门外的嘉兴寺、德胜门内的瑞应寺等处。



恭亲王奕訢手迹

办理“抚局”时奕訢一直都忍受着洋人的骄横和咄咄逼人，但随着外交、商务事务的谈判增多，奕訢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洋人为什么会那么强。交涉中，他意识到，大清国不仅仅在军事上是失败的，在外交上也是被动的。这使他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政治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赞赏洋人的精明、眼界的开阔和对工作的敬业态度。

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很多的被动也是因为对洋人的不了解造成的。比



如说，扣押英国外交官巴夏礼之时，巴夏礼用英文写的外交文书，当时的清朝官员鲜有能够翻译的。这种局面决定了很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处理对外事宜。况且《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交涉事务逐渐增多，清政府原来的“六部”架构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急需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统率各部。但是，奕訢又不敢自专，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咸丰帝的排斥猜疑中，小心翼翼地平衡二者的关系。

奕訢受命留守京城，逃亡热河的咸丰帝时常听到身边的近臣肃顺、载垣、瑞华等人对奕訢的诽谤，说他与洋人走得很近，得到洋人的支持，有不臣之心。这样，本有矛盾的两兄弟之间的隔膜就更深了。在如此局面下，奕訢不得不处处小心。但是，要处理对外关系，他又不能不与洋人交往。因此他觉得应该设立总理事务衙门。

应该说，奕訢请求设立总理衙门，也是有一点儿私心的。根据咸丰帝的谕令，他奉命将办理“抚局”、换约等交涉事务完成后，外交之权亦须交回军机处接管。但是，按照祖制，亲王是不能入值军机处的，不想交回权力的奕訢感到必须另外设立一个机构，否则外交以及政治权力就有可能旁落他人。为了不被军机处那帮反对他的人干涉，他又建议军机大臣兼领总理衙门。表面上这个机构仍然是受军机处的节制，实际上这却是为了能设立总理衙门这个机构而采取的策略，以此排除军机大臣的干扰和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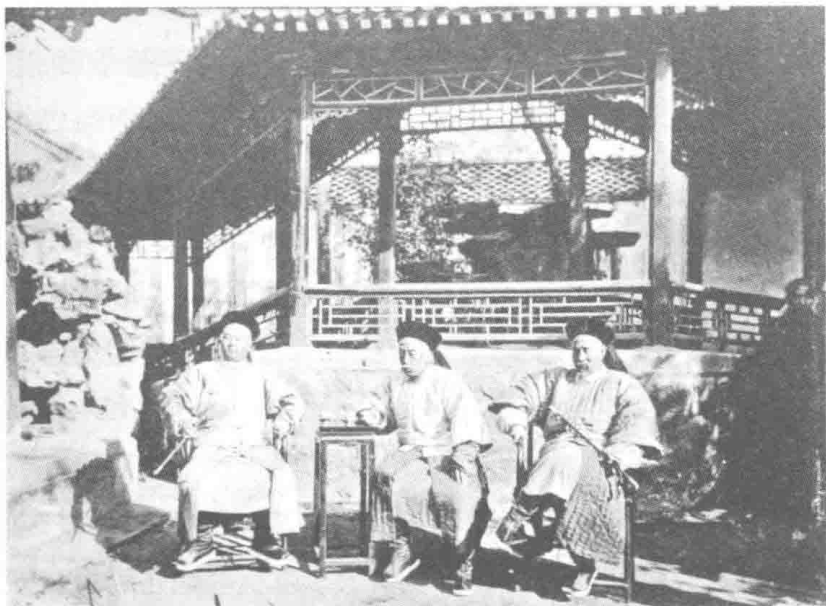
奕訢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明确说明，对于设立新的外交机构，之所以采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名称，主要是受了《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文的启发。这两个条约中分别提到俄国主持外交的大臣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总理各外国事务大臣”。这样的官称也正是奕訢受命主持“抚局”、与洋人交涉事务所正在担当的角色。况且，在清代官制中，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大臣，已经有“总理”某某事务的名号，如“总理行营事务”“总理练兵事务”等，因此，奕訢认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一个对外交涉的机构，既可以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且不违背大清祖制。

基于这样的认识，恭亲王奕訢与一同受命负责同列强交涉议和的文祥、



桂良等于1861年1月11日联合向咸丰帝上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

文祥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取的进士，咸丰帝出走热河时，他被任命为署理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京主持议和。桂良则是恭亲王的岳父，他在外交议和、与洋人打交道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北京条约》签订之前，他曾经奉命与列强进行过交涉。三人在与列强的交涉中，都有相同的感受，因而联名上了这道奏折。当然，他们都是久经官场之人，提出建议也不会直接要求咸丰帝答应这件事。



总理衙门官员合影，图为宝璜、文祥、成林三人（右起）

在奏折中他们很有策略地分析了大清国屡屡被动挨打的原因——抱着传统的华夷观一成不变。当时世界大势，西方的技、器都优于中国，中国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要的就是改革外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奕訢等人在奏折中说：

窃维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

①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



奕訢等人指出，过去对于“夷患”都是“专意用剿”，但这并不是十分行之有效的办法，总是今天剿了明天又来，甚至发生更大的破坏活动。他们在奏折中对此作了分析：在西方列强中，英国人最为蛮横无理，俄国人则十分贪婪，法国、美国荫附英俄为虎作伥，“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以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①。

奏折中对列强的分析，基本上符合他们的特点。针对列强在华的表现，故目前对他们只能安抚，不能专意用剿。并且上奏折指出：“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轻于一试。”“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②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符合清政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实际情况。奕訢指出，一些人认为，办理洋务“不利我土地人民”，这是片面和错误的——只片面地看到了西方国家以工业化发展、通商贸易为手段的掠夺与聚敛财富、占领殖民地、领土扩张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要维护领土安全、保护土地和人民，就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正视、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与他们建立对等的国家关系，以此缓和大清与西方的矛盾这一方面。

奕訢建议设立总理衙门，还有反对端华、肃顺等保守派一味排外思想的意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肃顺等人顽固排外，使英法政治、经济触角伸展受阻，列强看到只要“怡亲王、端华、肃顺继续掌权，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认了条约，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了和我们不友好的倾向”^③。

奕訢等人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将导致列强入侵的罪责全部推给

① 贾桢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4页。

②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一册，第5页。

③ 严中平译：《1861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载《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



负责这场战争的端华、肃顺集团，还说联军之所以攻进北京城，完全是端华等人对列强怀有忿忿之心的结果；并苦口婆心地对咸丰帝说，如再坚持这一政策，北幸木兰、移宫热河也非圣安之地，唯一的抉择只能是“抚”。对洋人主“抚”，怎么抚呢？就是设立专门的夷务机构，负责办理与洋人的各种交涉事宜。奕訢在奏折中还说，根据既往的交涉经验，洋人是很重视条约关系的。

在奏折中，奕訢等人还指出设立总理衙门也是应对国内局势的需要，“综计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御侮，譬如蜀之待吴”。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同西方列强侵略者给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较：“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从而提出了“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的战略目标。

奕訢把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以后办理外交的对策措施和“自图振兴”的基本国策。奏折中还附带了设立总理衙门的章程六条，首要的一条就是，“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具体的理由和设想是：“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②

章程的其余五条为：“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新添各日关税，请分飭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各省办理国外事件，请飭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飭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飭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③

当时已经逃亡热河的咸丰帝看到奕訢的奏折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①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6—327页。

②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一册，第6页。

③ 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毕竟刚刚经历了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劫难，这时的咸丰帝心有余悸，迟迟不能回鸾，这使他心中有一种流离感。奕訢的奏折中提出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目的是处理好夷务，这对于咸丰帝来说也是深为期待的。

咸丰帝通过奕訢等人的奏折了解到自秋狩巡幸木兰以来北京的困乱状况：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京师已经失去了秩序，富绅大户纷纷逃离，各级衙门的官员也作了鸟兽散，使得国家机器陷入瘫痪局面。所以，咸丰帝急于回鸾，希望奕訢能够尽快处理好夷务。

咸丰帝朱批道：“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惠亲王绵愉等人遵旨详细阅读之后，认为奕訢等人所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建议“按照原议各条办理”。咸丰帝遂于1861年1月20日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批准施行。但是朱谕比奕訢原奏折多了“通商”二字，成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肃顺画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这个命名实际上代表了反对派肃顺等人的意志。肃顺当时也是军机大臣，因为是“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得靠祖荫，加之又很会溜须拍马，所以很早就进入内廷任职，到了咸丰朝时已位极人臣。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肃顺更是统领行在一切事务。在总理衙门这一机构成立的问题上他很想加以钳制，



限制这个机构的权限，将其降低到五口通商事务办事处这样没有权力或资格参加对内对外决策的临时性机构上。这样的限制，奕訢当然不能同意。奕訢明白，不删除“通商”二字，就意味着得不到外交权力，更不会引起外国人的重视。

当然，《北京条约》的签订也使奕訢感到，要使列强与清政府通力合作，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就必须通过外交的努力，赢得他们的认可。因而他据理力争，强调对于通商事宜，上海、天津已有南北通商大臣驻扎专理，总理衙门在京不便遥控。更重要的是，洋人虽然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必滋疑虑”^①，要求去掉“通商”二字。奕訢等人态度坚定，言词恳切，最后咸丰帝终于批了“依议”二字，但还是力图限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限。

说到总理衙门权限，奕訢初议中有“事宜机密者，即令各该大臣、将军、督抚、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径咨总理衙门”之说。咸丰帝批谕却是：“至各省机密事件，（自）应照例奏而不咨，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著无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理衙门，以归划一。”^②这是咸丰帝仿照嘉庆四年（1799）为限制军机处权限，规定各省、各部院陈奏事件，不许奏报军机处之例。他此举也是有意限制总理衙门，不令其与各省发生直接关系，以防皇权受其侵越。

咸丰帝这样做，当然是担心奕訢有了权力，有一天会坐大，难以制约，但是奕訢坚持己见，并在奏折中向咸丰帝表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减，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③。奕訢这个承诺，化解了咸丰帝心中的疑虑，最后咸丰帝终于在奏折上批了“依议”二字。自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得以成立。

① 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第11页。

② 贾祯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721页。

③ 贾祯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692页。



1861年3月11日，奕訢派员前往礼部将铸好的“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牌子领回，并照会英法各国公使，机构正式投入运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一方面是应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不得已；另一方面，既是对传统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政策的抛弃，也是清政府通过这样一个机构解决争端、走向国际外交的开端。随着这一机构在日后外交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清王朝想恢复旧制，撤销这一机构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西方列强认为总理衙门的成立是中西方“沟通”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听说这件事后，即前往总理衙门祝贺，称赞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①。

总理衙门的主要职能是对外交涉和办理通商事务，类似于今天的外交部，权限又比外交部大，兼具对外贸易和海关税务之权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概念里，洋人都是刁蛮强横的“蛮夷”，况且又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朝野上下谈虎色变，没人愿意与洋人打交道。朝廷中的许多部门对于凡是带“洋”字的事务和问题，一概不过问，一股脑地推给总理衙门，这样就使得总理衙门的职能显得特别乱，它不但掌管了外交、商务，甚至铁路、电讯、矿务、海军、传教等也一并归其经办。

在职能作用不断扩大的同时，其外交对象也不断扩大。最初的外交对象只是英、美、法、俄，后来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当然，外交的扩展也是在被动的局面下进行的。

奕訢在成立总理衙门之时，自认为专办与英、法、美、俄四国的外交交涉，其他国家概不与闻。可是这四个国家却利用这个当口纷纷要求清政府承认公使驻京。事实上，他们已经擅自决定派出公使在京办公了。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公使驻京是确定无疑的，后来又签订了《北京条约》，西方各国虽然表示可以不驻京，但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体现，西方各国公使还是相继驻京，因为此时各国公使都已取得了用西方礼节拜

^①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